

清代新疆天山南路维吾尔社会结构与变迁

张世才

内容提要：清代新疆基本社会结构的形成可追溯至当地伊斯兰化初期，蒙古入侵虽冲击了当地原有的社会结构，但随着民族融合的发展，原以职业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模式并无根本上的变化。叶尔羌汗国后期最大的变化是和卓阶层的崛起及建立起有利于本阶层的政教合一权力结构，清政府对天山南路的统一是从对当地社会等级结构与权力结构进行彻底有利于自己的改造开始的，虽然清政府最终变成了一切权力与威望的来源，但当地社会仍等级森严。新疆建省后，原有等级结构的松动和阶级结构的强化是新疆社会结构变迁的主要特征，这种变化具有从封建时代向近代化方向转变的进步意义。

关键词：新疆 社会结构 伯克 宗教职业者 平民 阶层 和卓

中图分类号：D69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12）01—0023—14

清代新疆天山南路维吾尔社会既有长时间的稳定发展，也有剧烈的冲突动荡，原因是多方面的，用社会学的方法从整合分化入手探讨其社会结构的变迁，是一个新的研究途径。研究清代回疆的社会结构，主要着眼于寻求其时代的特征与意义，只有从历史的角度做比较研究，才能揭示其社会结构演变的轨迹，发现其中的一般规律。

一、清代以前伊斯兰化时代南疆的社会结构

伊斯兰教大规模传入新疆南部地区对天山南路社会结构的形成与变迁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的结果直至1759年清政府统一天山南路初期仍然存在。

国内学者将社会结构定义为“是用来表示社会被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集团和各集团之间稳定联系体系的术语。”^① 确定不同的社会集团一般从分析等级概念入手。等级概念与阶级概念不同，等级主要指按身份、职业等，将社会成员分等，规定其承担不同的权利、义务，阶级的概念是指社会中在职业、收入、权利和社会影响方面彼此有别的大的团体，这些团体是自发形成的。等级与阶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法权身份，后者是经济地位。等级与阶级不一定一致。历史上的维吾尔社会本质上属于等级社会，阶级表现为等级，往往根据其身份与职业来确定其社会地位。

喀喇汗王朝时的社会结构状况在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一书中有清晰的表述。

^① 舒小昀 《论社会结构的划分》，《唯实》2002年第7期。

《福乐智慧》的作者优素甫·哈斯·哈吉甫通过四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间的对话,表达了作者对社会、法度、伦理道德、哲学、治国之道等问题的看法,作品较清晰地展示了建立在职业结构基础之上的社会结构的状况,作者面对社会结构剧烈变化的现实,有“礼崩乐坏”的切肤之痛,希望在宗教的基础之上,借助一套社会伦理思想来调整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形成一股以国王为主导,传统文化与宗教伦理思想相结合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整合力量,来稳定当时的社会结构。就当时的职业结构来说,作为社会资源的职业种类相对于漠北回鹘汗国时期丰富了很多。以作者谈到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职业看,可将其归纳为三个阶层:1. 贵族阶层——国君;2. 特权阶层——宫廷办事人员、大臣、将领、御前侍臣、宫监、使节、书吏、宫廷司库、御膳监、侍酒官;3. 平民阶层——黎民、圣裔、哲人、学者、医生、巫师、圆梦者、星占士、诗人、农民、商人、牧人、工匠。作者对每一阶层在作品中做集中描述,说明他已意识到这三个阶层的存在,并且对每一个阶层采用不同的叙述语体,如对贵族与特权阶层是引导与劝戒,对平民阶层是尊重与希望。他还从国王与宫廷人员、宫廷人员与黎民百姓、国王与黎民百姓的关系——从不同社会集团间的关系来阐述其对社会结构整合(包括合法化的价值观念、文化教育制度、政治组织与社会控制体系、社会经济组织及制度等)的理解,强调了要发挥宗教应有的社会调适功能。《福乐智慧》中对作为统治阶级的国王及特权阶层有不少其共同特征的描述:

首先,国君的身世要纯正高贵,要英勇无畏,有狮子的勇气。父亲是君主,儿子天生是国君,儿子应当有父亲的胆识。^①

用你的右手挥舞战刀,用你的左手施舍金银;说话时舌头要如糖似蜜,尊卑贵贱都会向你称臣。^②

身世优越,即天生优越,优越之人,出人头地。^③门第高贵之人秉性和善,对人民怀一片赤诚心田。^④

很显然,无论国王还是大臣,都无法忽视血统与门第,这是平民阶层进入极权与特权阶层最大的障碍。但任何社会不同等级间的界限都不是绝对的,都会提供流动的机会,只是自由程度上相差很大。《福乐智慧》中谈到:

国君器重臣仆,出于他的功劳,谁若建立功劳,低贱亦可变为尊贵。立功吧,奴隶因功劳而成为伯克,谁没有功劳,心愿万难得遂。^⑤

不幸的人因立功而获得高位,无能的人永远被拒之门外。为国君效力要忠贞不渝,建立了功劳,会百事顺遂。^⑥

但为国王立功的机会并不多,因此,一般的平民阶层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不大。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伊斯兰教虽已占统治地位,但对社会各阶层的控制远不像后世那样严格,所谓的圣裔也仅是国王与大臣关心与尊重的对象而已,并不享有特权,地位与普通平民差不多。^⑦ 文中不少地方直

①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著;郝关中等译 《福乐智慧》,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260页。

②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著;郝关中等译 《福乐智慧》,第274页。

③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著;郝关中等译 《福乐智慧》,第262页。

④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著;郝关中等译 《福乐智慧》,第290页。

⑤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著;郝关中等译 《福乐智慧》,第84页。

⑥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著;郝关中等译 《福乐智慧》,第85页。

⑦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著;郝关中等译 《福乐智慧》,第559页。

接引用代表民族文化精华的警句谚语来说明事理，这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特征。

西辽时期，按照伊宾·阿尔·阿西尔的记载“他们占据了整个突厥斯坦国家。当他们占领城市以后，对于它的居民未作任何改变，只从每户——从城市居民，此外也从农村居民——收一个第纳尔”^①可知，西辽时期维吾尔社会基本上仍保持了以原有的以职业为基础的社会结构。

蒙古的入侵与统治为当地社会带入了许多草原游牧社会的思维习惯与统治方式，也严重冲击了当地社会原有的结构。蒙古作为一个有共同认同的群体，在被统治民族身上强行获得了渴望的特权，在社会结构中普遍拥有较高的等级地位，这种等级地位又依靠不易变化的血统、民族认同观念来维持。后来虽然由于在中亚及蒙兀儿斯坦的蒙古人陆续接受了伊斯兰教，民族融合的速度大大加快了，“不论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其原因与其说是由于血统的混合，不如说是由于这一民族皈依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传播始终会促使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发生变化。”^②民族融合的结果是这种某一民族垄断一个或几个社会阶层的局面发生了变化，社会等级地位的确定逐渐排除了民族因素，亦即标准由二元变成了一元，等级间的流动性增强了，这应该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民族的完全融合要经历很漫长的历史过程，起码在叶尔羌汗国初期这种高等级社会阶层对权力的民族垄断特征尚很明显。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在《中亚蒙兀儿史》中谈到了叶尔羌汗国时期的社会基本阶层：于阗和哈实哈儿的居民可以分为四类。一类叫秃曼（Tuman），意思是农民，他们臣属汗，每年向汗交租税。另一类叫忽钦（kuchin），意思是士兵，臣属于我的家族。第三类叫爱马（imak，或作 aimak），他们每年都有一定量的谷物和衣物等薪给（mukata），也臣属于我的家族。第四类是司法部门的官吏，以及清真寺与礼拜场所的管理人，他们大部分出自我的家族。这些人不必在此一一列举。^③应该说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只是对构成当时社会人数最多的平民阶层作进一步的分类而已。除了平民阶层，叶尔羌汗国还有特权阶层：汗与各级大臣及宗教封建主。俄文版《楚刺斯史》的译注者阿基穆什金在谈到当时国家的关键职务时说“诸如汗的阿塔雷克、大臣、叶尔羌和喀什噶尔阿奇木，库什伯克，伊沙噶伯克，木特幹里”。很显然，叶尔羌汗国是一个等级社会，“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的这种社会划分，基本上是以民族—职业为标准，它反映了叶尔羌汗国当时及其后一段时间的社会经济结构；但这不是阶级划分，未能提示出其社会阶级对立的实质，即秃曼中地主与农民的对立，爱马中牧主与牧民的对立，以及整个社会中封建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的对立。”^④

叶尔羌汗国时期社会结构中另一重大变化是原本为平民和卓阶层的崛起与等级地位的上升，特别是汗国中后期出现的黑山派与白山派两大和卓系统，操纵朝政，废立君王，上至军政要务，下至百姓生活，无不受和卓家族势力的影响。其中两个因素对这种情况的出现起到了关键作用，一是高贵的血统，一是所谓的一些有关和卓的灵验之事，就前一因素讲，其意义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顺应了伊斯兰教重视血统的传统，这也使得和卓最终有机

① 阿西尔《全史》，多伦堡本，卷十一，转引自罗姆金·B. A.：《吉尔吉斯人及吉尔吉斯地区历史资料》，第一辑，莫斯科，1973年，第66页。

②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著；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中亚蒙兀儿史》第一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3页。

③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著；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中亚蒙兀儿史》第二编，第215页。

④ 魏良弢《叶尔羌汗国史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92页。

会剥夺汗权，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阿基穆什金也说“按我们的看法，最后所提到的情况是这种系谱的伪造性的毋庸置疑的证据。很明显，由和卓们本人制订乃是为了证明他们对王朝最高权力的企求也有其出身上的‘神圣性’。”^①“他们的世系在狂热的穆斯林看来是毋庸置疑的，其渊源比那些掌握世俗大权的汗和速檀长久得多。”^②就后一因素而言，和卓们充分照顾了当地人传统文化中迷信观念深厚的特点，“这些流沙荒漠给亚洲人的迷信思想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影响，而它给这个地区造成那样多鬼怪和幻象的故事，也毫无足怪。”^③“这些教士的陵墓变成了有求必应的圣地。历代诸汗还赠与大量土地予以供奉，然后再由主持陵墓的长老以墓中所葬的那位圣徒的名义把无数恩典赐给愚昧的农民。”^④

宗教和卓阶层最终颠覆了叶尔羌汗国汗权，走上了权力与地位金字塔的顶峰，他们制定的制度、甚至他们的思想成了那个时代南疆维吾尔社会整合的基础，自然他们也成了世俗的清政府统一天山以南地区后主要的打击对象。

二、清代建省前南疆的社会结构

清政府对天山以南的统一实际上是一个通过激烈的武力对抗实现政权转换的过程，这种转换也使南疆维吾尔社会社会结构的整合与冲突进入了新阶段。整合包括建立在社会合作基础之上的社会资源有序配置、社会内部各要素（如社会群体、阶级等）相互依存及政治参与等。冲突则涵盖文化与观念的冲突、非法政治斗争、以经济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反抗等。整合往往受制于组织化的社会体系（合法化的价值观念、文化教育制度等）的调适能力，如果调适得当，就会使整合克服分化，抑制冲突的发展，保持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反之，则会使分化克服整合，导致社会冲突的剧烈发展。当这种冲突一旦突破社会结构自身的调节能力，就会造成结构的变迁与重组。而冲突的加剧则与基于社会分配体系之上的社会分化体系（主要指社会等级结构、阶级结构、权力结构等的生成）有关。

清政府统治南疆之初也是新的社会等级结构、权力结构生成之时，清政府对其等级结构与权力结构进行了彻底有利于清政府的改造。

在叶尔羌汗国后期，在南疆维吾尔社会出现了一个集世俗权威与宗教权威于一身并且自诩有高贵血统的和卓阶层，而世俗的官员——伯克完全依附于和卓阶层，他们职掌的变化甚至生死都由和卓们决定。如《西域闻见录》卷四“未归王化以前，是日之阿奇木伯克入寺礼拜毕，即有阿浑等议其贤否，以为贤则留之，以为某事无道，某某事尤无道，则与回众废而杀之，以故阿奇木多拥兵自卫。今虽不敢擅而兵仗，尚沿其旧，是日回人之拜答钦宴亦犹中国之元旦也。”^⑤从中我们不难判断和卓们与伯克们相比显然身处权力结构的更上一层。除此之处，宗教上层在经济

① Шах - Махмуд ибн фазил Чурас: Хроника. критический текст, пер., комм., иссл. и указ. О. Ф. Акимовичина, Москва, 1976. стр. 256.

②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著；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 《中亚蒙兀儿史》第一编，第141页。

③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著；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 《中亚蒙兀儿史》第一编，第79页。

④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著；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 《中亚蒙兀儿史》第一编，第141页。

⑤ [清] 椿园七十一：《新疆輿图风土考》（五卷本）卷四，上海点石斋，清光绪8年（1882年）。

生活中也垄断性占有更多的土地与劳动力资源,这一点此处不再赘述。

关于清代南疆的社会阶层结构情况,1858~1859年间在新疆考察的乔汗·瓦里汗诺夫有准确的描述“小布哈拉(малой бухарии)的居民就其社会地位和影响来看,可分为三个法定阶层:官吏(伯克)、宗教人士(阿訇)和平民。前两个阶层的人免征赋税。第三个阶层又可分为城市居民和种地人两种。”^①瓦里汗诺夫谈及三个阶层的划分时,显然更多地关注了他们经济生活状况,马克思也非常关注社会结构中的生产关系“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②对这三个阶层的存在状况特别是对他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进一步研究也是我们认识清代南疆整个维吾尔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最基本的工作。

1. 伯克(官吏)阶层

鉴于历史的教训,在清朝政府统一新疆的过程中,有意扶持利用世俗的官员阶层建构自己的统治基础,令其署理维吾尔族地区的各项民政事务,大大提高了伯克在维吾尔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二十五年六月(1760年),高宗便指出“阿浑乃回人诵经识字者,与准噶尔喇嘛相似。从前厄鲁特等不知事体,听信喇嘛,致生变乱,岂可使回人仍因旧习。著传谕舒赫德等,晓示各城回人,嗣后诸事,唯听阿奇木等伯克办理,阿浑不得干预”。^③虽宗教上层——主要是白山派和卓并不甘心失去曾拥有的权力与地位,但是与清政府的较量却一败再败,“其叶尔羌、阿克苏、乌什各有霍卓,恐怕大兵查拏,皆隐姓名,充当阿浑,念经修善。”^④由各级伯克组成的行使维吾尔社会全部民事行政权力的阶层形成了。

伯克阶层的存在首先与清政府法律规定有关。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之初,高宗便传谕兆惠:“将来办理回部,唯于归顺人内择其有功而可信者授以职位,管理贡赋等事”。^⑤也就是说,只有有功于清朝政府并且可信的人,才能被任命为伯克。所以首先被任命为伯克的是早已归属清廷的哈密、吐鲁番地区的王公贵族,二是归属不久的原回部统治者,如霍集斯、鄂对、噶岱默特等。可是到乾隆后期及嘉庆年间,在清朝政府统一新疆的过程中,著有军功而被封爵者多已去世,于是出身门第又成了选拔伯克的一个重要条件。《回疆则例》规定“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等三城阿奇木伯克缺出,由驻扎各城大臣将应调人员出具考语,如伊等祖父著有劳绩,并将世袭爵秩一并注明,移咨参赞大臣汇总,按其世袭品秩开列衔名,请旨调补”。^⑥这又表明,由于门第成为选拔伯克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有爵秩的王公贵族及其后代不但优先得到任命,而且被授予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三个重镇的阿奇木伯克。

至道光八年(1828年)平定张格尔叛乱后,清朝政府选拔伯克的标准更加系统、具体。宣

① Ч. Ч. Валихан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пяти томах. Том 3. Алма-Ата 1985. стр. 163.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页。

③ 《清高宗实录》卷六一五,“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六月辛丑”条,第15~16页,见新疆民族研究所:《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第五册,1978年,第2137页。

④ 璧昌《守城辑要》第二册,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刻本。

⑤ 《清高宗实录》卷五七〇,“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九月戊戌”条,第26页,见新疆民族研究所《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第四册,第1792页。

⑥ 肇麟等《回疆则例》卷二,清光绪34年(1908年)铅印本。

宗明确指示“嗣后，各城三品至五品伯克缺出，由本城大臣查明，先尽出力受伤或家口被害之人；次尽死事之子孙，次尽出力世家，并视其人才能否办事，逐细声明，照内地体制造具四柱清册，一劳绩，二资格，三人才，四世家，填注事实，出具切实考语，将应补之人开列四、五员，咨送参赞大臣验看。”^①这样劳绩、资格、人才、世家便成为清朝政府选拔任命伯克的四项标准。

清政府参照中原职官系统，为伯克规定了具体的品秩，不同品秩的伯克其经济待遇与政治权力区别很大。“宠以品级”的结果是在伯克阶层内部又产生了新的阶差：大伯克（三、四品）与小伯克（五、六、七品）的差别，即大伯克在城，小伯克在乡。真田安通过对伯克人员籍贯的分析认为，清朝伯克制度存在着内在矛盾，即土著伯克与非土著伯克的对立。因三、四品高级伯克多为非当地人士担任，所以这种对立又表现为城市与乡村间的对立。^②

高级伯克基本上来自几大回王家族，其他阶层的人，特别是南疆库车以西地区的维吾尔人几乎无望成为高级伯克。小伯克的社会声望，文化特征，价值观虽与大伯克都有许多差异，但当时阶级与阶层的一致性，使他们身上仍表现出许多共同之处，突出表现在对待本民族群众反抗清政府压迫上。瓦里汗诺夫也持类似的想法：小伯克虽没有祖遗领地，然而他们的享受亦不亚于贵族，佣人给他们供应粮食、食物、金钱。只要官达五品，即可得到土地、住宅和金钱。凭借这些财产的助力，他们的后代享有继承权。^③官吏们组成了一个与人民格格不入的对立阶层，全然效忠于清朝官吏。^④

在清政府统治南疆之初，1765年2~8月间发生了乌什变乱。变乱发生之初我们看到了南疆高级伯克的表现：变乱发生后，叶尔羌的阿奇木伯克鄂对“日领伯克齐聚大臣衙署，起更始散。其地乃宁贴无事。”^⑤“阿克苏回众亦微有不安之意，时其阿奇木伯克色提卜阿勒第赴京入觐，回至肃州，七日夜驰行六千余里，入阿克苏城，回众乃不敢动”^⑥“库车办事大臣鄂宝既带阿奇木伯克鄂斯满前赴乌什，而城中不逞之徒亦思因之作乱。伊什罕伯克阿拉雅尔稽查严密，日带伯克等晨赴办事大臣衙署，起更始散，以故得以无事云。”^⑦如果乌什变乱中清廷的坚定支持者主要是从清的统治中获益较多的高级伯克阶层的话，随后发生的几次变乱，特别是1820年开始的张格尔入侵中，中、下级伯克的表现可使我们看到整个伯克阶层对清政权的阶级认同意识在增强。

张格尔入侵前在回疆联络交结的也主要是宗教界人士，如喀什噶尔的阿浑博巴等，众伯克等并无一人得信。即使那些身为朝廷命官，却被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的家人凌辱之伯克，也只通过正常渠道向上控告而已，并无与张格尔勾结“滋事洩忿”之举。^⑧张格尔入侵，“将图舒克塔什卡伦城池烧毁，戕害副护军参领音德布并满兵十三名，余丁一名，玉斯图阿尔图什（上阿图

① 《清宣宗朝实录》卷一三八，“道光八年（1828年）七月辛丑”条，第9~12页。

② 〔日〕真田安《清伯克制度创设期喀什噶利亚绿洲社会》，载护雅夫编《内陆亚洲、西亚的社会与文化》，山川出版社，1983年。

③ Ч. Ч. Валихан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пяти томах. Том 3. Алма - Ата 1985. стр. 163.

④ Ч. Ч. Валихан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пяти томах. Том 3. Алма - Ата 1985. стр. 178.

⑤ 〔清〕和宁撰《回疆通志》卷十二，清嘉庆九年刻本。

⑥ 〔清〕和宁撰《回疆通志》卷十二，清嘉庆九年刻本。

⑦ 〔清〕和宁撰《回疆通志》卷十二，清嘉庆九年刻本。

⑧ 曹振鏞等奉敕纂《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三，道光十年刊本。

什) 六品阿奇木伯克阿布都尔满亦被戕害;^① 玉斯图阿尔图什回庄六品阿奇木伯克托里牙克,将上年从逆回子他什帕拉特拿获,审明后传集回众,环视斩决梟示,得旨嘉奖。”^② 张格尔之乱中站在清政府一边而遇害的小伯克还有不少,说明不仅清政府用法律的形式把伯克阶层确定下来了,而且本阶层的人员也认同了。作为一个阶层,总有其特有的文化特征,文化人类学的基本任务和研究对象为“对于所有这些文化的差异、交流和共生的逻辑和规则的认识和解释”^③,我们不妨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加深对伯克阶层的认识。清廷为了令全国汉人蓄留满洲发辫,不惜大动杀戮,强迫服从,彻底执行,但从《回疆则例续例》中,均可知清廷不仅不强制回人留长辫,还有相反的规定“各城回子王公以下之有世职,及尽忠有功伯克之子孙,愿留长发辫者,准其蓄发。其余伯克之中,如有愿留发辫者,阿奇木及伊什罕伯克之官至四品者,亦许蓄发,四品以下概不准蓄留发辫,以示限制”。^④ 目的便是“得此鼓舞奋興勉期向化”^⑤,显然是把这种行为看成了文化认同的一种表现了。瓦里汗诺夫谈到个中原因时说“因为在新疆,商人作为一个阶层来说是不复存在的,加之宗教人士不具影响力,于是乎在贵族和平民之间横立着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贵族们的利益、特权和身份与人民格格不入。他们恪守清朝礼仪不同人民往来,尽管人民见到他们时要毕恭毕敬地低头行礼,然而对他们憎恨至极。”^⑥ 伯克们以南路官员为楷模,在一切方面仿效清朝官吏,但他们知晓宗教教规、国家历史,有汉文和满文知识。在伯克身上“文化涵化”的规则再次具有了说服力。显然,这种阶层差异已转化成了阶级对立,这无疑对当时清政府在南疆的统治是有利的。

2. 宗教职业者

15 世纪末伊斯兰教已渐控制西域世俗政权,伊斯兰教职人员已形成一个独立的阶层,包括“司法部门的官吏及清真寺与礼拜场所的管理者”。^⑦ 16~17 世纪史籍《拉失德史》中载,喀什噶尔大毛拉玉素甫曾任茂特色布(宗教检查)伯克,其续编记有受理民事诉讼的哈孜伯克和设于军队的斯帕哈孜等,皆位大伯克之列。^⑧

准噶尔蒙古统治时期,当时整个南疆社会在政教合一的和卓阶层的主导下开始整合,当时主要的社会阶层有宗教上层——和卓,管理世俗事务的各类伯克,承担繁重赋役的平民,与清统治之初的南疆社会阶层结构基本相同,但就各阶层的社会声望、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与经济实力、文化影响力而言,和卓阶层无疑远胜于伯克阶层。

清政府对南疆的统治是从对和卓阶层的打击开始的,首先是支持白山派和卓波罗泥都——大和卓回南疆从黑山派手中夺取统治权,随后又派出大军直接与大、小和卓作战,军事打击严重削

① 《清仁宗实录》卷四,“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九月甲子”条,第20~22页,见新疆民族研究所《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第八册,第3482页。

② 《清宣宗实录》卷二七,“道光元年(1821年)十二月丙戌”条,第13页上,见新疆民族研究所《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第八册,第1792页。

③ 麻国庆《走进他者的世界:文化人类学》,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2页。

④ 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九三理藩院禁令、回部禁令及《钦定回疆则例》续纂例。

⑤ 章佳容安辑《那文毅公筹画回疆善后事宜奏议》卷七八,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2~4页。

⑥ Ч. Ч. Валихан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пяти томах. Том 3. Алма-Ата 1985. стр. 162.

⑦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著;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中亚蒙兀儿史》第二编,第215页。

⑧ Шах - Махмуд ибн фазил Чурас: Хроника. критический текст, пер., комм., иссл. и указ. О. Ф. Акимовича, Москва, 1976. С. 94, стр. 180.

弱了和卓阶层的有生力量。在平定和卓阶层发动的一次次反叛后,清政府总会进行所谓的“善后”,其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没收和卓及其追随者的土地、园林等财产,这使和卓阶层大伤元气。和卓阶层在生产关系中丧失的还不仅仅是大量的私有土地,过去,他们都有大量的门徒,这些人向和卓们提供什一税,甚至“在外国有许多门徒,他从他们那里接受什一税。”^①但在白山派和卓们反叛清政府后,清政府严禁教民将财产奉献给国外的和卓,因此,这部分收入也没有了。

但在清代南疆社会等级结构中,宗教职业者在宗教和政治方面的影响极为强烈。“伏查回子最重阿浑,以其熟悉回经,堪为众人之表率,愚回惟阿浑之言是从,是阿浑乃众回纲领,以罗易固人心。”^②“各城大臣及阿奇木之于回众原不能随时亲身开导,教谕回众,全在阿浑。”^③“……各名下应交纳粮赋及‘阿尔板’钱文概予优免。其余喀什噶尔、英吉沙二城黑帽阿浑子弟霍卓拉克萨顶等八名亦准免其粮赋,以示奖励。”^④清政府“因俗而治”首先即意味着必须承认以宣扬宗教精神为使命的和卓阶层存在的现实合法性,承认和卓阶层拥有的社会地位,以至有对该阶层过于迁就的嫌疑。“对饶有影响的人士,非但不追究参与谋反之事,反而留用原职,甚而给以重用,委任高官。这种政策颇像土耳其人的政策。如他们启用叛乱者为所发乱之省的省督。处决赛伊赫·阿訇是例外之举。这是按阿奇木伯克的意愿行事的,是追逐个人私利的结果。这是由于赛伊赫·阿訇是喀什噶尔最富殷的人。”^⑤事实上南疆公共权力也并非由伯克一个阶层单独行使,行使这种权力的机构——伯克衙门更像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组织,^⑥因为大量的职业宗教者也参加了当地社会管理与日常行政工作,特别是司法活动主要由他们负责。“宗教人士掌握司法审判大权。阿里木阿訇是宗教界首领和头目,同时亦是总审判官。”“地方权力机构,即镇子的官吏,在各个方面听命服从州的管辖。在喀什噶尔和州内任职并领取薪俸的官吏有61人,教职人员55人。在叶尔羌,官吏136人,教职人员95人。从古代起,小布哈拉的这种官职体系就有了。”^⑦在这里,我们看到清代南疆世俗的伯克阶层与宗教和卓阶层在权力结构中几乎处在相同的地位,变化在于从前伯克阶层是和卓意志的执行者,而现在和卓等人必须接受伯克的举荐与挑选,按伯克的要求办事。由此也使南疆与中亚浩罕等地有了文化生活上诸多的差异。小布哈拉“教职人士通晓古兰经及其注释、国家历史。与布哈拉的毛拉相比,对事务有正确的合乎时务的观点。”“在这里,伊斯兰教要遵循当地风俗习惯,宗教狂热有所收敛。妇女享有自由。”^⑧瓦里汗诺夫甚至认为这是“对伊斯兰教偏见的胜利。”^⑨但综上所述,职业宗教者阶层特别是和卓阶层由于个人财产——大量土地被没收,使他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已大大下降,从而为南疆维吾尔社会结

① 穆罕默德·萨迪克·喀什噶里著;陈俊谋,钟美珠译《和卓传》,《民族史译文集》八,中国社科院民族所,1980年。

② [清]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卷七十八,1932年刊本。

③ [清]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卷七十九,1932年刊本。

④ [清]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卷七十八,1932年刊本。

⑤ Ч. Ч. Валихан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пяти томах. Том 3. Алма - Ата 1985. стр. 177.

⑥ 周泓《伊斯兰教在近代新疆的世俗化与地方化——伯克制度及新疆伊斯兰文化与内地的相异》,《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⑦ Ч. Ч. Валихан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пяти томах. Том 3. Алма - Ата 1985. стр. 173

⑧ Ч. Ч. Валихан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пяти томах. Том 3. Алма - Ата 1985. стр. 164.

⑨ Ч. Ч. Валихан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пяти томах. Том 3. Алма - Ата 1985. стр. 171.

构在清政府主导下整合提供了可能。但是,由于南疆最有社会声望的阶层——伯克阶层对其他阶层的文化影响力有限,这种整合始终没有进步,而与此相反,职业宗教者阶层社会地位的下降构成了南疆社会结构中冲突的因素,整合与冲突力量的此消彼长使南疆社会长期处在动荡不安中。

宗教职业者的社会威望与影响力与其文化身份也有很大关系,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文化对社会结构变化的重要影响。“社会结构要变化,要发展,要同改变了的形势相适应,只有通过社会中各个阶级的思想习惯的变化,或者说到底,只有通过构成社会的各个个人的思想习惯的变化,才会实现。社会的演进实质上是个人在环境压迫下的精神适应过程;变化了的环境同适应另一套环境的思想习惯已经不能相容,这就要求在思想习惯上有所改变。”^①但清代南疆维吾尔社会的不同阶层间远未形成一致的信仰、价值观及态度,而清政府也忽视了对南疆社会的整合。“陛下不强迫人们去加入自己的人群。他喜人们集团各自不同的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②因此,在清统治时期,南疆社会始终存在分化与整合的不平衡性矛盾,每当伯克制度职能失效,宗教便会重新以一种社会角色、组织形态和整合力量抬头,这也是南疆多次变乱的深层次原因。

清代南疆维吾尔人中受教育水平最高的是宗教界人士,但他们在清政府的统治下找不到实现自己价值的途径,他们所认可的应获得高等级的资格是以伊斯兰社会中的普遍看法为依据的,即对宗教的虔诚、有关宗教的丰富学问、显赫的出身等,但这些清政府都不认同,他们的共鸣者便是那些逃亡的和卓,加入和卓的队伍便成了他们的选择。

清代南疆社会各阶层中虽然伯克阶层拥有的政治权力、经济实力,使其有资格成为最有声望的社会阶层,可以为其他阶层提供更多的服务,但由于其权力之源在于作为异教徒的清政府,因此,伯克掌握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甚至伯克阶层存在的合法性不光受到宗教界的质疑,也不为普通民众所尊重。在政治权力还是宗教力量主导维吾尔社会整合上清政府与宗教势力是尖锐对立的。伯克阶层与宗教上层相比,其优势不仅在于其手中的行政权力,而且在于其经济地位,而流亡的宗教人士常要冒险入境获得少量财物,这使得这个阶层的功能不能发挥,每次入侵最重要的事就是大肆搜括财物,这使得这个阶层功能紊乱。

清代前期南疆的等级结构给维吾尔社会带来了某种程度的贵族至上的倾向。只有贵族才有权出任南疆一个大的行政区——一城的阿奇木。伯克有徭役优免权、官职抵罪权、朝觐权、后代优先递补官职权。大伯克有剃发易服权。虽然如此,阿訇在新疆社会有权威影响,伯克亦不敢以势相加。“凡回子家务、争讼事件,阿訇一言剖断,回子无不遵依”^③。由此,清朝政权在社会政治领域,虽有意提高了伯克的地位,而这并没有避免伯克与阿訇势力的勾连,有时反而促成二者的联通,阿訇皆由伯克推举,“尤为隐患”^④。

值得注意的是,职业宗教阶层与伯克阶层一样也享有免税权,因而这两个阶层都有特权阶层的特征,职业宗教阶层也很难被排除在世俗权力之外,他们也常与伯克一起在社会生活中共享权力。如农村“渠道的管理系由村民共同组织,负责人员之产生也都由村民推举。每一水渠还有渠官,叫做米拉布伯克,全县所有之渠归大阿洪掌管,这里表现了农业与宗教结合的特点。”^⑤

①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40页。

② 毛拉·穆萨·赛拉米著;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译《伊米德史》(油印本)下册,1960年,第168页。

③ (清)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卷七七,1932年刊本。

④ (清)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卷七七,1932年刊本。

⑤ 傅希若《新疆的农业社会》,《西北论坛》1948年1卷6期。

3. 平民

平民,包括城市平民、佃农、半自耕农、自耕农和庶民地主。从法律来看,他们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是国家赋税、徭役的承担者。

新疆原本可耕之地就很少,约占全省总面积百分之二十四,且多为沙漠高山所隔断。南疆从库车起,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迤迤向西,经阿克苏转南至喀什,再向东至和阗被分隔为库车沃洲,阿克苏沃洲,喀什沃洲,莎车沃洲,和阗沃洲,其中最大者不过八百万亩之耕地。^①

就土地占有关系讲,该阶层内部主要分为有地农民与无地农民两类,有地农民所具有的土地数量因南疆土地总量的限制与伯克的侵夺而十分有限,增加土地的手段也不多,开荒受水源限制,买卖土地建省前很不活跃,实际上可能并不存在大地主,自营小地主数量较多。

平民阶层承担的赋役负担在清政府统治南疆之初即有明确规定:(1)种地交粮(什一税);(2)传递驿站书信;(3)按惯例贡麻塔(土布);(4)随时上报民心所向;(5)充当各种差役。除以上五种差役外不得增减,地方官享受规定的俸禄土地和人口,不得随便鱼肉百姓。^②但实际上该阶层所受社会压迫最甚,社会声望也很低。新疆纳税的贫民阶层的处境和地位极为悲惨。清朝官吏和伯克们,甚而满族士兵都瓜分平民。他们每人都有佣人。城市佣人要供应主人肉、油和其他生活日用品,而农村佣人要耕地,轮流到主人家里支差,听命使唤。^③

伯克与职业宗教者阶层属特权阶层,作为特权阶层他们应该以合法的途径提供平民阶层所需的各种服务来交换其生活所需,但他们不能正常行使职能而又不断强索,这种交换则失去了公平性。平民阶层作为生产阶层,以自己的劳动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但他们的生存状况不断恶化,被强加了各种不平等的交换。他们也以逃亡、参加和卓组织的暴动来摆脱旧的交换关系和重建新的交换关系。生产阶层作为社会的基础,其稳定性对整个社会存在至关重要。同治年间的农民起义使南疆维吾尔社会各阶层进行了重新的组合,但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新疆建省才基本上完成。

三、清代南疆维吾尔社会三大阶层间的互动关系

互动关系首先体现为三大阶层的开放程度与跨阶层流动性。

从社会流动的观点看来,伯克阶层是一个很难进入的社会集团,清政府制定的任用伯克的四个标准:劳绩、资格、人才、世家,宗教职业者阶层与平民阶层人员同时符合这四条几乎不可能,因此,伯克阶层在一定程度上有了世袭的因素。《伊米德史》中也谈及这一点“当初那些引兵前来的人们,都以序分封了王、公、贝子、贝勒,被任命为各处的阿奇木,受俸禄,从此七城地方官吏除这些人的后裔以外,别人很难得封。”^④

该阶层由于清政府的着力扶持最终与其他两个阶层间拉开了距离。还引《伊米德史》中的例子来说明:当初南疆最早投靠清朝的六位伯克“人们为他们在乌什塔拉塑像兴祠,可汗秦追

① 傅希若《新疆的农业社会》,《西北论坛》1948年1卷6期。

② 毛拉·穆萨·赛拉米著;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译《伊米德史》(油印本)上册,第77页。

③ Ч. Ч. Валихан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пяти томах. Том 3. Алма-Ата 1985. стр. 162.

④ 毛拉·穆萨·赛拉米著;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译《伊米德史》(油印本)上册,第64页。

封他们为‘七城的主人，启蒙者，保卫者’（这些都是宗教语言，原本是用在和卓身上的）以表彰他们的功绩，并下令，凡出任七城官吏上任之前，必去这些伯克们的祠前扫墓。这些建筑一直保存到了伊斯兰时代（阿古柏时期），从此不论官吏、商人或从北京来此路过者，都必须前去扫墓，住宿一夜，按照他们的习惯烧纸叩头，求其保佑，然后才起程赶路，不然将被认为是犯罪，这个地方被称为是‘伟大的房间’，这些伯克的后裔，便自称是‘伟大的房间’的后裔。伊斯兰以后，祠堂被破坏了，伯克进入庶民的街道。”^①

该阶层的存在与发展由于与皇权相联系，所以在南疆维吾尔社会有较高的社会声望，这主要体现在他们与另一阶层——宗教职业者阶层的关系上。《伊米德史》中谈到这样一件事“回历1281年（1865年）正月初一，当时因犯罪而罢官的原叶尔羌阿奇木艾合买德王伯克正在库车等候可汗的命令，东干和穆斯林进宫求见此人，艾合买德王伯克却说‘我祖辈饱受皇恩，为可汗效劳，托可汗之洪福，有了官位，有了田地和家庭，除此之外，我几次面朝可汗，我怎么能做出反抗可汗的事来。’人们都起来翻脸了，大家吵着说‘你还等着你的和太’，在一怒之下将艾合买德拖出了宫邸，送他离开了人间。此时有一个叫热西丁的和卓隐居在额西丁维力麻扎尔，整天祈祷修道，不为人所知。东干和穆斯林杀了艾合买德王伯克以后，便请他出任首领……额西丁无可奈何地便被扶上了白毡，接受了世代相传的加冕礼，设立了百官。”^②

上面的例子中起义农民先找王伯克出来担任领导，实际上也是出于对其社会声望的考虑，只是在他坚辞后，农民才退而求其次，找到了蛰居麻扎苦修的和卓。伯克阶层的社会地位为普通百姓认可，也为他们自己所坚持。还举《伊米德史》为例，塔吉阿奇木伯克在同治年间库车农民起义后处境艰难，便有意借重当时的库车民军领袖额西丁，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的儿子。“和卓虽说是赛依德（圣裔），但他们毕竟和庶民一样，所不同的是他们是最虔诚的信徒。然而王伯克们则不同，他们祖辈受皇恩，奉行着可汗的命令，有着皇帝赐封的地位，管理过地方，所以他们不会很快地走下自己的显位。后来可汗的大军到来，七城地方又重回到了可汗手中以后，塔吉阿奇木伯克作了喀什噶尔的阿奇木。塔吉阿奇木伯克当了喀什噶尔阿奇木以后，便想让自己的女儿离开他们的家。”^③虽然后来婚未离成，但阿奇木伯克的心思已经说明了他们所代表的两大阶层间社会地位的高下之别。

不过伯克阶层也并非完全封闭，不可进入。道光末年，正是中英鸦片战争结束不久，国力大衰，清政府便想到在南疆卖官鬻爵筹集经费，但也因此使伯克阶层第一次与其他阶层间有了大量的人员流动。《伊米德史》说“官吏派人在街头巷尾出告示说‘谁借给军队钱粮，给他官位。’有些迷于官职的富豪用钱买上了官职。总之那时谁有钱，不管他是恶棍、流氓、酒鬼、无赖、赌徒都可买个官作。本来这些人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做官是怎么回事，出钱买了官，就要用官把钱捞回来，这就是他们的良心。那些通事也敢明目张胆地交易卖官。那些世代忠于可汗的伯克王公们，失去了过去的恩宠。”“过去的伯克成了下人，过去的下人成了伯克，钱和官使得势的人忘记了一切，乡绅在他们的眼里没有了地位，庶民的眼泪打不动他们的心坎。”^④开放程度高，流动

① 毛拉·穆萨·赛拉米著；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译《伊米德史》（油印本）上册，第65页。

② 毛拉·穆萨·赛拉米著；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译《伊米德史》（油印本）上册，第86页。

③ 毛拉·穆萨·赛拉米著；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译《伊米德史》（油印本）上册，第134页。

④ 毛拉·穆萨·赛拉米著；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译《伊米德史》（油印本）上册，第82页。

自由是阶层间界限消除的主要标志,虽然只是开始,但已预示着这个阶层离分化瓦解的那一刻不远了,不久清政府南疆统治的大厦在阿古柏入侵的冲击下顷刻间坍塌了,这与清政府主动放弃其为权力与威望的来源者地位,南疆社会结构紊乱,社会分化剧烈有关。

宗教职业者阶层原本就不是一个封闭的阶层,除个别宗教贵族外,平民百姓通过接受宗教教育都有成为该阶层成员的可能,因此,原本这两个阶层间就有密切的互动关系,每次和卓起事,总会有大量的平民响应,在一个伊斯兰社会,宗教职业者的活动有极大的感召力,他们常被视作正义的化身,有些平民参加和卓组织的叛乱,被俘后至死仍口呼和卓,让人喟然。^①

平民阶层是补充其他两大阶层的源泉,他们接受良好的宗教教育即可成为宗教职业者,后来有钱的平民也可通过捐纳获得官职,但其他两大阶层的人员在新疆建省前进入平民阶层者并不多,即阶层间的流动多呈现一种单向的趋势。

四、新疆建省与南疆社会结构的变迁

同治年间新疆农民起义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横亘在不同阶层间的樊篱,特别是伯克阶层的成员,一些被杀,一些在“伊斯兰时代来临,祠堂被破坏了,伯克变成了庶民。”^②阶层特权丧失,彼此的法律地位日益接近。因此,清朝政府恢复了它在新疆的统治之后,除哈密王“所部回众尚多,差堪自立”,其他王公伯克都已经“家产荡尽”,衰败没落了。^③清军到来后,特准库车郡王和吐鲁番郡王的后代“承袭世爵”。但仅是一个爵位,却“无阿奇木伯克可兼,而兼俸无几,卯粮寅支,负债既深,拮据万状。”^④当清政府通知吐鲁番新袭郡王玛木特年班进京,去朝觐皇帝叩头谢恩时,他连路费都筹措不起,不得不请求展缓,因为耕地已是“听兵民自占,旧时经界无可遵循”。^⑤昔日的燕齐农民基本上都摆脱了人身依附,南疆出现了大量的自耕农。刘锦棠在亲历南疆各地之后,无可奈何地承认,“旧制……荡然无存,万难再图规复”^⑥。南疆社会结构中出现了较大变化。

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南疆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上,即行省制代替了伯克制。1884年11月17日(光绪十年九月三十日),清政府批准添设新疆巡抚、布政使各一员,19日(十月初二日),正式授刘锦棠为新疆巡抚,仍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事宜。以甘肃布政使魏光燾为新疆布政使。^⑦至此,新疆建省完成。

1887年4月(清光绪十三年三月),清政府又将“所有伯克名目全行裁汰”^⑧从法律上废除了伯克制度,伯克占有的大片土地由官府承租。

刘锦棠还提出设义塾,让维吾尔族儿童学习汉语、汉文及四书五经,勤学不倦者,经厅州县

① 曹振鏞等《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四十九,道光十年(1830年)排印本。

② 毛拉·穆萨·赛拉米著: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译《伊米德史》(油印本)上册,第65页。

③ [清]刘锦棠《刘襄勤公奏稿》,第一五卷,第11页,甘肃省图书馆藏本。

④ [清]刘锦棠《刘襄勤公奏稿》,第一五卷,第11页。

⑤ [清]刘锦棠《刘襄勤公奏稿》,第一〇卷,第59页。

⑥ [清]刘锦棠《刘襄勤公奏稿》,第三卷,第44页。

⑦ 《清德宗实录》卷一九四,“光绪十年(1884)九月辛未”条,第27~28页。

⑧ [清]奕訢等《平定陕甘新方略》卷三二〇,第13页,光绪朝刊本。

考述，由道复试请奖，给予品级，以图在新形势下从意识形态领域加强对南疆社会的整合力，但有些学校强迫维吾尔族学生学习汉语文，灌输汉族的封建思想，结果维吾尔族学生“茫然不知所谓，愈益厌苦之。师或防其逸，闭置室内，加以桎梏。”^①

与此同时，南疆维吾尔社会也出现了一些新式教育机构，就其意义而言，与举办义塾有相同之处，即都有助于在传统伊斯兰社会传播新的思想观念，有助于形成新的社会结构，清政府对此一般也是支持的。1883年在阿图什伊克莎克乡出现了由胡赛音·木沙巴耶夫和巴吾东·木沙巴耶夫兄弟两人倡议开办的新式学校，讲授语言、算术、历史、地理、自然、体育、音乐、美术、俄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及汉语等。^②

社会整体性转型不仅对社会生活深层各方面发生影响，就连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也在所难免。建省前后正是南疆伊斯兰教变化最显著的时期，它不得不与变化了社会实际相适应。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不少宗教人士著书立说，纷纷发表对时局的看法，“那个时期这些作者著作的出现说明他们具有理解19世纪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强烈愿望；应该强调指出，这种理解是以符合封建主和宗教界统治者的利益为前提的。……由于所有的作者都有宗教感情并在宗教著作的基础上接受教育，他们的著作都含有强烈的正规的伊斯兰教条的影响。”^③我们也可将这些著作看作是职业宗教者对变化了的现实世界的真实思想反映。

这种变化也反映在等级结构的变化上。等级结构的松动和阶级结构的强化是南疆建省后社会结构变迁的主要特征。还在19世纪下半期农民起义爆发前，由于清政府在南疆卖官鬻爵筹集经费事实上已经打破了伯克阶层与其他阶层间的法律上的隔阂，农民起义更使这个阶层彻底分崩离析，1887年，清政府不得不从法律上取消了这个阶层。同时，由于清政府的军事打击，职业宗教阶层中的所谓血统高贵的和卓们也不得不重新回到麻扎等宗教机构中去，随着南疆维吾尔社会新式教育的肇始，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力也日渐式微，“现实生活强迫作者将目光投向人民群众”^④，这个阶层与平民间原本在阿古柏统治时期拉大的距离在清政府重新恢复统治后又逐渐缩小了。

等级关系松动的同时，阶级关系得到了发展。在土地经营中，征用农民无偿劳役的农奴制经营模式在大多数土地上已为地主经济形态下的租佃或雇工所取代，社会上已不存在法定的阶层，在建省后的南疆维吾尔社会形成了主要由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小农及雇农组成的社会结构体，原先的等级结构为阶级结构所取代。南疆农民逐渐摆脱了被束缚在土地上的状况，经济关系摆脱了法权关系，社会流动增加，地区差异在缩小，南疆维吾尔社会结构出现了向近现代意义上的转变，阶级关系成为社会的基本关系。

虽然建省前南疆社会结构变迁已经发生，但速度很慢，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政治、法律层面上变革的不彻底，建省后虽废除了伯克制，但只是改换了官称，乡约政教兼一，虽“无伯

① [清]王树枏《新疆图志》，卷三八，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

② 伊不拉欣·尼雅孜《阿图什县伊克莎克乡开办近代新学教育的情况》，《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80~83页。

③ Д. И. Тихонов. уйгурски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конца XIX и начала XX в., 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1954. IX.

④ Д. И. Тихонов. уйгурски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конца XIX и начала XX в., 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1954. IX.

克之名，而有伯克之实。”^①“新疆农业人口是占大多数的维吾尔人，他们是伊斯兰教的信徒，所以新疆的农业和宗教保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如上述水利职司与杂卡特都是表示农业与宗教的结合。这种情形和政治关系并不相似，在封建制度下，封建领主或地主等级制度是与封建政治的等级相适应的。而宗教中各种职司则带有公共服务的性质。杂卡特之所以能变成文化教育费也是说明伊斯兰教对公共事业的热忱。”^②

尽管如此，南疆也出现了许多有利于社会结构朝近代化方向转变的有利因素。经济关系成了使社会诸要素以特定方式结合为一个整体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南疆维吾尔社会虽然还存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各地区社会结构的转变是不同步的，但建省后面向现代社会整合的发展仍使南疆保持了近60年的安定与发展。

“没有结构，便没有社会。”布罗代尔的这句话道出了社会结构在整个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社会是人类为追求更为和谐的生存环境与更为公平的利益分配于社会交往中通过交互作用而结成的一种共生群体。^③社会结构表现为一种纵向序列，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因此而有高下之别，社会阶层因此而衍生出利益的冲突。这种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产生了个人的阶层意识，也产生了一个人相对于别的阶层时与同阶层者间的纽带以及个人的阶层利益。阶层意识的出现，意味着首先要分清集团利益以及集团利益之间的对抗性。而且，社会分层还常常导致文化分层，所以，人们有时将文化分解为不同阶层的文化。阶层意识是文化冲突的场所，在这里，互相对立的社会阶层提出各自相互冲突的利益要求。

对于任何社会来说，冲突无处不在，重要的是要在冲突中实现融合。社会阶层之间的融合是指原有的阶层结构从刚性向弹性转型，即从封闭走向开放。其具体表现是边缘化，即产生介于原有阶层之间的边缘阶层或群体，出现不同于原有阶层的新兴阶层和群体。不仅社会阶层内部如此，社会阶层之间亦如此，对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来说更应如此。

清代建省后南疆维吾尔社会结构，确实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客观上主要表现为社会共生性的增强、稳定性的增加。但历史的发展总是反反复复，后世的统治者并不能完全避免重蹈覆辙，像杨增新治疆时期依靠扶植某个阶层的少数精英，刻意照顾他们的利益等做法，实际上强化了社会的分化，打断了正常的社会整合进程，违背社会整合应遵循开放平等的时代精神，这事实上成了其身后乱局的深层次原因。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李文博

责任校对：王文洲

① (清)王树枏著《新疆图志》卷八八。

② 傅希若《新疆的农业社会》，《西北论坛》1948年1卷6期。

③ 赵毅，刘晓东《16~17世纪中国社会结构问题笔谈》，《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ng Empire and Sogdian:

focused on Sogdian paying tributes to Tang

Xu Xuya (1)

Abstract: That Sogdian paid tributes to and were subject to Tang Empir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The first period is between 618 AD and 655 AD; the second is from 656AD to 712AD; and the third ,from 713AD to 772AD. The frequencies and time for Sogdian to pay tributes to Tang are closely related to political situations of Xiyu , namely Western regions , and Tang's influences. Sogdian had striven vigorously to break away from control of Western Turk during the first period and resisted , together with Ferghana , invasion of Arabian with the help of Tang during the second and third periods. Meanwhile , Tang dynasty had invested them with ranks and so as to build a defensive system with the kingdoms of Kang , Cao , Shi and etc. in the Western Regions in order to withstand the aggression by Arabs.

Key words: Tang Dynasty; Central Asia; Sogdian; tributes

Things related with Uyghur Shijieban's being an official of Yuan Dynasty Shang Yanbin (11)

Abstract: This paper is to study Shalaban's and his son Shijieba's attitudes and influences in the political events that Tiemudashi was recommended to be Zhongshuyoucheng (prime minister) according to the book Shanju Xinyu (New Words Written at Mountain House) and other related literatures.

Key words: Yuan Dynasty; Uyghur; Shijieban and Shalaban

Uyghur social structure and change on south Tianshan road

in Xinjiang in Qing Dynasty

Zhang Shicai (23)

Abstract: The basic social structure of southern Xinjiang in Qing Dynasty dates back to its early days of being Islamic. Though Mongolian aggression shocked the local social structure , they did not change its fundamental pattern which was based on professions because of the fusion of ethnic groups. The maximum change happened with the rise of Khoja stratum in later period of Yarkand Khanate , when hey established a power structure uniting politics and religion as a whole. It started from the thorough reform of local social stratum and power structures that Qing government united the south Tianshan road. However , the local society maintained rigidly stratified , although Qing government became at last the source of whole power and prestige. After Xinjiang province was established in 1884 , the stratum structure loosened up , while a class structure was formed and enhanced gradually , featuring a great change of social structure in southern Xinjiang at that time. This change is of progressive meaning of transforming from feudal times into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South Xinjiang; social structure; Beg religious professional common people; stratum; class; change

The Wushi Incident and the regulation of Qing Dynasty's Huijiang policy

Wang Li (37)

Abstract: Wushi Incident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event happened when Qing Dynasty united Xinjiang. This revealed some shortness of its policy for control over Xinjiang.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auses and the course of the incident first , and then explains what measures Qing government adopted and how